

往事如昨

# 那个托举我的老师

马连炜

小时候，我在乡村小学念书。班主任张老师，三十岁左右，留着齐耳短发，上课时总架着一副黑色镜框的眼镜，眉眼温和，看上去很斯文的样子。

有一次，张老师在课堂上问，你们的理想是什么？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回答，有的想当科学家，有的想当解放军，有的想当音乐家，还有的想成为飞行员翱翔蓝天……每一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凌云壮志。唯独我，没有举手，却把头紧紧地埋在书本里。

张老师应该知道，我是一个生性腼腆，课堂上很少主动发言的学生。别的孩子整日追跑打闹，嘻嘻哈哈，而我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，不爱扎堆儿。

于是，张老师就特别关照了我。她微笑着问：“小炜同学，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呀？”

我听到张老师的问话，努力想站起来，可内心太紧张了，脸憋得通红，不知怎么应答。

她又说：“你可以坐着回答。”

我定了定神，使劲儿想了想，唯唯诺诺地说了一句：“老师，我想当作家。”

同学们听后，哄堂大笑起来。我像是一只犯了错的小兔子，局促又害羞，恨不得一头钻进桌洞里。

张老师见状，快步走下讲台，径直来到我的跟前，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小炜同学的志向很好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的。”说着，张老师就鼓起掌来，同学们也跟着鼓起掌来。

张老师特别照顾我，看到我喜欢读书，她就千方百计地帮我借阅读课外读物，使我在故事的海洋里自由畅游。她在课堂上想方设法向我提问，提高我的语言组织能力，消除我内心的怯懦和自卑。她会为我的一点点进步，当着同学的面大张旗鼓地夸奖我，激励我。

记得小升初那年，我的作文拿到了整整四十分的满分。成绩揭晓的时候，张老师格外欣喜，特意抽出时间跑到我的家里来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和我的父母，并细细地和我攀谈起来，说出文章的出彩之处，并把它当成了范文保存起来，留给我母校的学弟学妹。

面对张老师热切的目光，我支支吾吾说不出太多感谢的话，但心里却满是暖意。这份重视和鼓励，让我的理想像一颗饱满的种子，在我心里扎下了根，我悄悄许下的心愿：长大以后，要做一名作家，用文字记录生活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长大成人了，分配在县里的一家国营单位上

班，我的理想也在慢慢实现。不是写的什么大作，而是经常在厂工会的广播里发表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作品。生活见闻、内心感悟、新闻点滴，都化作一段段质朴的文字，伴着广播声在同事们之间流传。

自那以后，我在奔波于工作和生活的间隙笔耕不辍，虽然没有成为专职作家，却始终与笔墨为伴，一篇篇短小的文稿，承载着日常的艰辛与喜悦，屡屡见诸各大报端杂刊。

当我回到村子，把一张张剪辑的文稿拿给张老师看时，她很是激动，言语间也满是夸赞。逢人便说，我这个学生写的文章格外感人，总能触动心灵。

几十年过去，张老师早已退休，安享晚年，但她还能时常地想起我。前几年落实政策，曾经的民办教师有补助，需要有大队集体和学生的证明。张老师找到我的时候，我还把自己的创作一一呈现给她，听她谈构思行文的想法。张老师一遍又一遍字斟句酌，勾勾画画，她慈祥的脸上，还挂着当年的那份一丝不苟的认真。我则站着，弓着腰身伏在桌上，毕恭毕敬地给她写下证明。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写的：“就是这个老师，她用无私的爱，让我最终实现了理想。”

怀故人

## 我的共产党员大哥

王德良

我大哥生于1927年，是家中的长子长孙。我小时候记不清哪一年，大哥突然从家中后窗跳出跑了，从此杳无音讯。几年后，从爹娘的交谈中我才得知大哥失踪的原因。

原来大哥是村里的第一任儿童团长，12岁随爷爷到午台（今属烟台市莱山区）以兽医身份为掩护，为地下党、八路军筹集药品救治伤员。后来，以小学教员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他十几岁就在区里县上跑交通，披星戴月风里来雨里去，有时一口气要跑上几十里山路。每次“受训”（到胶东抗大崑崙山学校学习）回来，烧上一大锅热水，把灰军装先烫后洗好几遍，水面上漂着一层又一层的虱子。因为奸特务告密我们家出了共产党，我被抓到区公所，吊在房梁上严刑拷打，逼着交出大哥及藏匿的枪支弹药。幸亏我爷、二叔及地下党营救，我爹才保住一条性命，但腿上留下终身伤残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大哥与家里恢复了联系。我们这才知道，他参加了解放莱阳、青岛及上海等地的战斗，后来参加接收青岛的工作并留在当地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在莱阳卫校上学，每逢“五一”“十一”假期，大哥都要到他家过节，与我促膝长谈做人做事的道理。返校后又写信鼓励我，要好好当个好医生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大哥资历不浅但职务不高，对此他始终无怨无悔，从不用手中的权力，为子女、亲属及家族谋私利。

我侄女小青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。上世纪70年代初初中毕业，因为小青的哥哥是现役军人，政府为她安排了一份工作。可她主动放弃照顾，要求和同学们一起“上山下乡”。对此，家人们有不同意见，我大哥力排众议坚决支持小青插队。当时她担任知青队长，在一次带队挖土方时，遭遇意外塌方以身殉职，年仅17岁。大哥强忍着悲痛，尊重当地政府意见，就地处理后事。我家兄弟姊妹8个，分散在辽宁、甘肃、江西及山东4个省，没有一个人是通过大哥的关系找的工作。大哥不是不惦记亲人，上世纪70年代，他用自己分到的“购物券”给家里买了一辆“大金鹿”自行车。大哥当时负责青岛地区的物资供应，有村干部找他批评化肥，大哥说：“化肥是国家按计划调拨物资，我没权力挪用。村里有困难，我可以向当地政府反映，能否照顾由地方自己定。”

2014年秋，我去看望大哥。临别之际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在咱家我吃苦最多，道路最坎坷。但一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我能活到今天、过上好日子就非常满足了。有人说我胆小怕事，但我觉得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，要对得起党组织和老百姓！”2015年7月18日，大哥去世了。在殡仪馆里老干部局的同志告诉大家，前几天大哥刚让儿子到局里交了最后一次党费。大哥身后没留下什么，只有住了50年的60平方米老房子，以及书架上近万册的图书。

## 正月听洋戏匣子

柳君

自从父母去世后，好长时间没有回老屋看看了。今年清明回去，把父母住过的老屋收拾了一下。收拾的时候，触摸着一件件老物件，看到父母年轻时的照片，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老屋里有一台老旧的洋戏匣子（留声机），看到它，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些年正月里听洋戏匣子的日子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，人们的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实行计划经济，物质条件相对差一些的胶东农村，基本上没有比较现代的东西，收音机、黑白电视机只在农村个别家庭才有。我的老家，就在这个200户左右的小山村里，我虽然住在农村，但父母是有工作单位的，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。从我记事起，全村唯独我家有一台洋戏匣子，不记得是父亲哪年捎回来的。

父亲每年都是腊月二十九或三十上午才能回家，每年正月初一，他都会把这台洋戏匣子拿出来，擦干净。从初一开始，我家总被本村听戏的乡亲挤得满满当当。这台洋戏匣子是父亲在烟台工作时买的二手货，还有几张唱

片，皮壳锃亮，手摇上弦，旋钮一转，磁头往唱片上一对，便有啾啾呀呀的唱腔、铿锵的鼓乐声从洋戏匣子里传出来。因为这个洋戏匣子，初一初二这两天成了全村人正月里最热闹的时刻。

每年正月初一一大早，年味儿还裹在爆竹碎屑的火药香里，父亲便把洋戏匣子准备好上好弦，安上唱片唱起来，来我家拜年的乡亲便不走了，堂屋及院子里早早就满了，炕上地下，坐着的站着的。老洋戏匣子稳稳摆在桌上，擦得干干净净，像个端坐的老神仙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摆弄着，打开开关，手摇着，上足弦，磁头一对唱片，熟悉的戏曲声便悠悠扬扬传了出来。印象最深的是梅兰芳的《玉堂春》、程砚秋的《苏三起解》、张君秋《打渔杀家》，后来还有了梅兰芳的《穆桂英挂帅》等等，几张唱片轮流放，中间弦不足时就跑调，时不时还要再上一会弦，一上午往往需要上几回弦，一段段唱腔混着年的喜气、街上的鞭炮声、天空的雪花，飘出院子、掠过街巷，把全村老少的音乐细胞都勾了过来，我们听着戏也没有心事出去拜年了。

老人们坐着马扎、小凳，青年人倚着门框，娃娃们掂着脚尖，扒上窗台，眼睛亮晶晶盯着那台洋戏匣子听戏，耳朵竖得老高。没有华丽戏台，没有鲜亮戏服，可那唱腔一响，人人都忘了寒冷，忘了辛劳，顾不上天空的雪花，也顾不上出门走亲戚拜年了。他们跟着节奏轻轻摇晃，跟着调子小声哼唱，脸上满是欢喜与沉醉。在听戏的间隙，说笑声响成一片，换片后又是鸦雀无声，静静地听戏。

初二这天，走亲戚的邻村人也循着声音找来。一进院门便笑着拜个年，不用多言，找个角落站着，静静听上几段。院子里人虽多，却格外安静，只有戏里的唱腔和偶尔的笑声，在正月的暖阳里缓缓流淌，邻里的情谊在婉转唱腔里愈发醇厚。

那些年没有电视、没有网络，一台老洋戏匣子，就是全村人的精神寄托。它装着岁月的温柔，藏着乡土的温情，把朴素的日子唱得有声有色。如今每当想起正月里围坐听戏的光景，那熟悉的唱腔、热闹的人群、浓浓的乡情，依旧清晰如昨。